

历史合力论再检视

李红岩

【提要】 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既是在一定前提下展开,又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为说明非决定性因素的作用,在平均值意义上提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直接动力、经济关系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力,构成马恩的主导观点。合力说不能代替动力论。马克思在直接动力的意义上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在根本动力的意义上贯彻唯物史观根本原则,在物理合力的意义上揭示历史全要素,在历史动态考察过程中统一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

【关键词】 历史合力 根本动力 直接动力

历史发展动力是历史理论的重大命题,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思想的理论系统之内,尤其占有重要位置。关于这个问题,原本不存在争议,因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此作过明确解答。但是,20世纪80年代却形成比较广泛的争鸣与讨论场面,其中最引人注目的论题,是围绕“历史合力”展开的。重新检视这场争鸣和讨论的情况,对于在新时代发展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是有意义的。

一、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明确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的直接动力。这一重大思想与观点,在经典作家那里既是明确的,也是始终坚持、从未改变的。如果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某些方面的观点并不那么明确、不那么容易理解,还存在争议的话(例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那么,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历史发展直接动力的观点,显然不在其中。

早在1848年1月的《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明确提出“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40年后,恩格斯对这句话作了补充,指出这是指“有文字记载的全部历史”。《共产党宣言》所讲的就是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因此恩格斯的补充对宣言所阐明的基本原理没有影响。继《共产党宣言》具体分析历史上的压迫者与被压迫者对立和斗争的形式与演变过程之后,经典作家不仅在许多著作中运用阶级斗争观点与阶级分析方法,而且以命题形式,对阶级斗争的历史作用作过明确性。比如1894年10月,恩格斯写道“自从原始公社解体以来,组成为每个社会的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种斗争只有在阶级本身消失之后,即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之后才会消失。”^①这是《共产党宣言》发表半个世纪之后所说的话。此后不到一年,恩格斯便逝世了。所以,阶级斗争动力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了一辈子的思想。这方面的文献,中国学者非常熟悉,不必再列举。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5页。

事情既然如此清楚,何以又会出现一场“合力论”争论呢?这是因为1890年9月21日,恩格斯在伦敦给德国出版商、《社会主义月刊》编辑约瑟夫·布洛赫(Joseph Bloch)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恩格斯谈到涉及历史合力的思想。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据此提出,经典作家的历史动力思想,应归结为历史合力论。因此,怎样解读恩格斯这封信,便成为问题的症结所在。

第一,恩格斯在信中确实提及历史合力思想,但它是有前提的。脱离这一前提,孤立地看待历史合力思想,违背恩格斯的本意。什么前提呢?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恩格斯说,“经济状况是基础”、“是决定性的”,这是“主要原理”和“主要原则”。这便是恩格斯论及历史合力的前提,是该信明确表达的第一主题思想。这里须特别注意恩格斯采用的字词。他用的全是“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主要原理”“主要原则”这样的“硬字眼”。谈及历史合力,当然应该时刻记着这些“硬字眼”;一旦忘记,便违背历史合力论的第一原则。

第二,恩格斯提及历史合力,是有强烈针对性的。换言之,有具体语境。脱离具体语境,抽象地看,同样违背恩格斯的本意。恩格斯所针对的,是“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的经济因素唯一决定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符合事物发展及思想传播的规律。一方面,信仰唯物史观的人越来越多,这是好事;另一方面,出现了简单化、教条化的问题,这是坏事。简单化最突出的表现,是经济因素唯一决定论。他们认为,只要抓住经济这个唯一的因素,便掌握了唯物史观的全部。恩格斯告诉人们,天下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他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不能据此就认为“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诚然,“经济状况是基础”、“是决定性的”,但除这个“主要原理”和“主要原则”之外,还有别的因素。这些别的因素,虽然不起决定性作用,但“也起着一定的作用”。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就是针对经济因素唯一决定论发出的告诫,目的是消解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理解。

第三,恩格斯提及历史合力,是为说明非决定性因素的作用。既然非决定性因素也起一定作用,那么,这些作用是什么又是怎样起作用的呢?于是,恩格斯带出了历史合力思想。恩格斯的论述非常深刻,非但值得学习,而且具有值得深刻阐述与引申发挥的价值。不过,就思想层次而言,它是在确定决定性因素的前提下展开的,所以,它具有开放性。换言之,它容许修正、补充、完善。非决定性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是恩格斯所说的那样?除恩格斯所说之外,还有没有其他形式?这些,是可以进一步思考的。

第四,历史合力思想,是在平均值意义上提出的。恩格斯说“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这就是说,“许多单个的意志”都参与、汇聚到了历史创造当中。尽管它们都是“意志”,“最终的结果”却不以任何一个意志为转移,因此历史就仿佛没有任何“意志”参与过似的,“像一种自然过程”;但实际情况是,各个人意志并不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04—606页。

上述论断,便是恩格斯历史合力思想的基本内容。它给我们的强烈感觉,是充满唯物辩证法精神。唯物辩证法精神既在观察视角的不断转换中体现出来,也在关于“单个意志”与“最终结果”像“自然过程一样”无意志的辩证关系阐述中体现出来。所谓“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就是历史规律。在规律面前,每一个人都很渺小;渺小到其意志可以忽略不计。但是,正是这些渺小的人,汇集成历史的整体场面和最终结果。因此,恩格斯这里表述的是一个平均值思想。但即使在表述这个整体平均值的时候,当恩格斯将视角聚焦于单个意志时,也不忘记它是由某个东西决定的。这个东西就是文中点明的“特殊的生活条件”。

第五,立足于平均值意义上的历史合力思想,不允许脱离“归根到底”的“决定性因素”或曰“主要原理”“主要原则”来进行理解。所谓“平均值”,归根到底是“决定性因素”之下的“平均值”。专注于“平均值”却忘记“决定性因素”,就会破坏恩格斯论述的完整性、系统性,最后只能是断章取义。

要正确地理解恩格斯的历史合力思想,必须将上述五个方面紧密结合起来,不可相互脱离。一旦脱离,必然陷入片面理解、误解乃至肢解。如果说恩格斯用历史合力思想代替了历史动力思想,那又如何解释他在逝世前一年还在强调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动力呢?阶级斗争非但“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还“总是”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这难道不是恩格斯的最终意思吗?

恩格斯致布洛赫这封信,既不神秘,也不难理解。它无非是要人们辩证地、全面地理解唯物史观,不要犯机械的单一经济决定论的错误。既不能以决定性因素去否定其他因素,也不能以其他因素去否定决定性因素。在把握决定性因素的前提下,要认真研究历史全要素,不能以为只把握住决定性因素就万事大吉了。恩格斯深刻地告诫人们,历史过程既是有意志的,也是无意志的。就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最终结果而言,历史就像自然过程一样,可以看作是没有“意志”的。就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而言,每个人的意志都是客观存在的。恩格斯告诉人们,这些意思本是唯物史观的题中自有之义,可现实中却总是有“许多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觉得只要把握唯物史观的“主要原则”、“主要原理”、“决定性因素”就足够了。面对这类诚心实意的愚人,马克思和恩格斯又“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做解释,这难免令人烦恼。所以,恩格斯通过给布洛赫写信,希望告诫人们,除“主要原则”外,在“描述某个历史时期”的时候,必须重视“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不然就会犯“错误”,甚至造成“惊人的混乱”。

在信的末尾,恩格斯特意提醒布洛赫,要“根据原著来研究这个理论,而不要根据第二手的研究来进行研究”。为此,他开列了四本参考书,依次是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资本论》以及他本人的《反杜林论》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对恩格斯这个特别重要的提醒,中国学者似乎并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它明确告诉我们,要准确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完整意思,仅仅看一封信是不行的。而一旦联系马恩的其他著作,就会发现,出现最多的是“动力的动力”、“动力的动因”、“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一类不那么“合力”的思想与字眼。

二、两种历史合力说

“历史发展动力”是新时期最早受到关注并广泛讨论的史学理论话题之一。1979年3月,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在成都召开。会上,戴逸做了题为《关于历史研究中阶级斗争理论问题的几点看法》的发言,提出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斗争不是唯一的历史内容,还有生产斗争、民族斗争、科技发展等非

常丰富的内容,因此不能用阶级斗争代替一切。但他肯定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伟大动力,不过不是唯一的,同时提出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直接的主要动力是生产斗争。刘泽华、王连升则在会上作了《关于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的发言,提出生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最终动力。由此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

同年11月下旬,四川社会科学院主办的《社会科学研究》杂志专门组织成都、重庆、南充的学者讨论这一问题。当时的情况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停止实行以阶级斗争为纲,把工作重点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上来。这是顺应党心民心 and 时代要求的英明举措,受到包括史学界在内的全国人民衷心拥护。史学工作者热情澎湃,积极主动地运用历史学的智慧来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服务。他们联系江青集团无限夸大阶级斗争作用、客观上败坏阶级斗争理论、给史学发展造成极大伤害的沉痛教训,希望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要义,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指导历史研究。因此,关于历史发展动力的讨论,既有现实背景,也有良好动机,成绩也很大。但是,由后来讨论的情况看,又发生了以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的问题。

讨论所形成的基本状态,是“阶级斗争唯一论”不再有人坚持,但“阶级斗争真正动力论”在许多学者那里得到了坚持。同时,出现了生产斗争根本动力论、生产力根本动力论、适合生产力的生产关系根本动力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动力论、社会基本矛盾根本动力论、物质经济利益根本动力论、人民群众原动力论、社会各种矛盾运动的合力动力论、直接地或归根结底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人的实践活动动力论、改良也能成为动力的观点,等等。^①在这些主张中,最引人注意的,是所谓“合力论”或“合力说”。刘大年先生称它是“动力问题的争鸣、讨论中别开生面的一种主张”。^②

最早提出“合力论”的,大概是伍宗华和冉光荣。他们在《社会科学研究》编辑部主办的会议上提出:“当我们运用唯物辩证法研究历史动力时,必须坚持从作用于历史的一切因素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冲突中,从它们之间多种多样关系的全部总和中去考察,即必须如实地把它们看作既相联系、又相矛盾的统一体,不是其中任何一种因素,而是所有这些因素的综合,它们在复杂的交互作用和矛盾冲突中融合而成那个总的‘平均数’、总的合力,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构成为历史演变的直接动力。”^③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没有提到恩格斯,而是引用了列宁关于人类社会是“一个十分复杂并充满矛盾但毕竟是有规律的统一过程”的论断。同时,他们也不否认存在“根本原因”或“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但是,“合力”与“起决定作用”的东西之间的关系,他们未予论述。列宁关于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真正动力”的明确论断,他们也未予引用。所以,这篇文章虽然提出了“合力”直接动力论,实则未能进行深入论证。

1982年,有学者提出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形成了历史合力的观点。^④对此,有学者提出批评,认为恩格斯所说的“合力”和“力的平行四边形”,都是从物理学上借用来的。而合力论者把物理学意义上的合力照搬到史学领域,混为一谈,将造成十分混乱的历史观。什么历史的是非功过,一概在所不计。这决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因此,应该区分物理合力与历史合力、历史规律与历

① 参见龚延明《关于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综述》,《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艾力云《历史发展动力问题讨论述评》,《史学月刊》1980年第1期。

② 刘大年《说“合力”》,《历史研究》1987年第4期。

③ 伍宗华、冉光荣《谈谈历史发展的“合力”》,《社会科学研究》1980年第1期。

④ 孔立、李强《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历史的“合力”之一例》,《光明日报》1982年8月16日。

史事件、历史合力与前进动力。^①此后,关于历史合力是不是历史直接动力的讨论,便在史学界开展起来。

1987年,刘大年在《历史研究》第4期发表《说“合力”》一文。这是一篇有代表性的文章,客观上将讨论带入了高潮。刘大年的基本观点是,“合力”不是历史前进的动力,恩格斯没有“合力”就是动力的意思。

刘大年首先辨析了“合力”与“动力”的关系,指出“动力”对应事物的性质,“合力”对应事物的数量。性质与数量不能分开,但混淆不得。讲历史发展动力,就是确定动力的性质,不是突出它的数量。假如立足于数量来确定动力问题,则“不成其为一种主张”。刘大年的这一观察与辨析,是非常敏锐的。

因为混淆了性质与数量的关系,刘大年认为,“合力”说的主张者陷入了一连串矛盾。首先,它使得动力成为一种抽象的没有质的规定性的东西,“大家辩论、聚讼不休的阶级斗争、人的本性等的界限,就成为可以泯灭的,或只需要从数量上加以区别的东西了。”其次,照“合力”说的逻辑,动力会出现接近于零的情况。换言之,对抗阶级的利害差距越大,斗争越激烈,历史前进的动力越小,这反而说明“合力”不成为其动力了。最后,依照“合力”说的逻辑,会出现拉车向前与拉车向后没有区别的荒诞局面,例如将日本军国主义看作中国取得抗战胜利的力量的一部分,等等。

刘大年提出,恩格斯讲合力,实际是在打比喻。比喻即使非常切合,也不能与实事同等看待。而且,恩格斯讲的是唯物史观里面一个小范围的问题,只能归于唯物史观的一个子系统之中,并不反映这个学说的整体系统。他认为,“合力说”并没有揭示出阶级斗争动力说的“缺陷”;既然揭示不出来,那就无法代替它,“显然不具备竞选的资格”。他表示,历史前进的动力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在阶级社会是表现为这种矛盾的阶级斗争。

刘大年其实提出并勾画了他所理解的“合力说”。这种合力说的本质在于不承认阶级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仅仅在这样的意义上,他才认为合力说“不具备竞选的资格”。如果说合力说根本就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动力说的意思,那么,显然就不属于刘大年的论旨所在了。至于在肯定阶级斗争动力说的前提下又该如何看待合力说,当然也不是刘大年的论旨所在,但他在文章中还是作了提示,即一方面肯定恩格斯的信函具有深刻意义,另一方面指出“平行四边形法则这个比喻,是最正确、贴切呢,还是有缺陷,没有找到最好的语言来表达?关于这一点,不妨进一步讨论。”表明他完全认可讨论的必要。

不过,在与刘大年商榷的文章中,实际又提出并勾画出了第二种“合力说”,即承认阶级社会历史前进的动力是阶级斗争的“合力说”。这样,便出现了两种“合力说”,一种承认阶级斗争动力论,一种不承认。承认阶级斗争动力论而又赞成合力说的那些商榷文章,虽然围绕刘大年的文章而展开,却不是“针对”刘大年的核心观点进行立论,因而在客观上,毋宁说是对刘大年文章的深化与细化。

比如一篇著名的商榷文章提出,恩格斯的论断“使我们在坚持唯物史观的经济决定论、阶级斗争理论等基本原理的同时,注意到社会主客体运动的有机统一;在坚持研究的全面性、整体性的同时,注意到研究的重点和动态”。这样的意思,显然符合恩格斯的原意,^②同时不违背刘大年的论旨。这

① 王启荣《李自成、多尔衮、郑成功能形成历史的“合力”吗?——与孔立、李强二同志商榷》,《华中师院学报》1983年第4期。

② 在信件末尾,恩格斯特别提到“原则”或“原理”与“应用”的关系,要人们在“应用”时必须格外小心。比如在“描述某个历史时期”的时候,仅仅掌握主要原理是绝对不行的。

篇文章认为,刘大年关于历史动力的总观点,“重申了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摒弃了阶级斗争是唯一动力的错误,是科学的。”这就在根本上与刘大年完全一致了。不过,作者对合力说作了不同于刘大年的界定,即它“没有否定唯物史观基本原理,更没有否定阶级斗争动力说”。既然“没有否定”,那当然也就重叠在刘大年的基本论点上了。重叠之后,作者又深化了刘大年的观点,即认为“历史合力论分析了历史动力理论各部分之间的联系层次和作用方式,更加具体地阐明了阶级斗争在动力理论中的地位,指明了阶级斗争动力说的适用范围”。“合力说”能够将阶级斗争的地位与作用更加清晰化,那当然是好事。但无论怎样清晰化,回到论题的出发点,作者还是得承认,确实也写下了这样的话:“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的集中体现”,阶级关系在阶级社会中是“人们相互关系中的主导因素”,阶级斗争因此而“成为历史运动中的根本动力或直接动力。”“以资本主义社会为例,它从产生、发展到衰亡的全部过程,都贯穿着阶级斗争。而且,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阶级结构简化,阶级斗争也相应公开化、激烈化,阶级斗争作为历史动力的伟大作用,比任何私有制社会都更为明显”。这样的话,与刘大年有丝毫区别吗?所以,作者提出,刘大年“关于历史动力问题的基本观点是正确的”,“目前史学研究中也确实存在着一种贬抑乃至否定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倾向,这其实是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难以令人信服”。作者并提出,“必须划清历史合力与折中主义、相对主义的界限”。^①这样的见解,无疑是正确的。

在“商榷”的名目下,一是基本观点与刘大年一致,二是对刘大年观点的深化与细化。究其原因,就在于作者提出了另一种与刘大年核心观点并不对立的“合力说”。或者说,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冠上了“合力说”的帽子。这样做是否合适?我认为不合适。道理很简单,既然论者以为“合力说”与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全部相合,那又何必命之为“合力说”,而不继续叫唯物史观基本原理呢?

如此看来,至少一部分学者与刘大年的所谓“商榷”,实质上并不名副其实。因为,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直接动力的根本观点毕竟得到了维护。如果说“商榷”就是指在这一前提下作更深入的讨论,当然值得鼓励,因为它可以促进对唯物史观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我认为,在坚持阶级斗争动力论前提下的历史合力讨论,其积极的正面价值,也正在此。但是,无论在怎样的界定意义上,我都不赞成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动力理论,概括为历史合力论。无论怎样抠字眼,无论怎样坚持阶级斗争动力说,都不应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发展动力理论命名为“合力论”。

在另两位作者合写的文章中,作者提出,恩格斯信函中“第二”所讲的“运动规律”“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而各种意志、愿望的活动表现为偶然性,为经济的必然性所支配。“第二”是在“第一”的基础上所作的深一层次的论述。作者写道:“合力的方向,总是比较靠近力量大的一方。当革命的进步的阶级战胜反动的落后的阶级时,合力的方向就会靠近历史发展的正确方向;当反动阶级得势的时候,合力的方向就会背离历史发展的方向;而当革命力量和反动力量处于均衡状态时,合力等于零,但这毕竟是暂时的现象。所以,合力的方向取决于各种意志的性质及其力量对比,它体现了合力的性质”。^②如果说这属于“合力”说的基本原理,那么,岂不更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所阐明的基本道理?对这些基本道理,必欲命之为“合力论”,有什么意义呢?

历史发展动力理论涉及的问题很多,也很复杂。比如怎样看待农民战争的历史作用,怎样确认历史的创造者与历史的主人,怎样看待历史发展过程中的“相互作用与终极原因”,历史动力理论是

^① 吴廷嘉《“合力”辨——兼与刘大年同志商榷》,《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② 陈孔立、施伟青《〈说“合力”〉质疑》,《历史研究》1988年第3期。

不是属于历史决定论或逻各斯中心主义?等等,都属于历史发展动力范畴内的问题。在这些议题上,理论研究工作很繁重。我认为,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动力理论归结为“合力论”,无法胜任这一应对工作。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遵照经典作家的提示,从他们那里汲取理论智慧。

三、马克思恩格斯的实践

前文已言,恩格斯给布洛赫开列了四本参考书。恩格斯特别指出,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是“运用这个理论的十分出色的例子”。所谓“这个理论”,是指“历史唯物主义”。^①因此,有必要依照恩格斯的提示,看看马克思是怎样具体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在运用中又是怎样处理动力与合力的关系的。

首先,在直接动力的意义上,马克思娴熟而鲜明地运用了阶级分析方法。在概括这部著作的总特点时,马克思说他所要证明的事件的局势和条件,是由法国阶级斗争“造成”的。他的写作目标,就是将“怎样造成”的过程揭示出来。对此,恩格斯1885年为第三版写的序言明确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的领域进行的,还是在其他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或多或少明显地表现了各社会阶级的斗争。”^②

需要强调的是,马克思使用阶级分析方法,总是与具体的历史环境、历史背景紧密结合,不放弃分析每一个历史要素,从而表现为一种历史的具体呈现,而非观念的演绎推演。他不仅细致入微地分析每一个阶级和阶级集团,而且对阶级集团的内部构成也全力予以揭示。仅巴黎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就揭示出它不仅包含一些生计可疑和来历不明的破落放荡者、资产阶级中的败类和冒险分子,还包含流氓、退伍的士兵、释放的刑事犯、脱逃的劳役犯、骗子、卖艺人、游民、扒手、玩魔术的、赌棍、皮条客、妓院老板、挑夫、下流作家、拉琴卖唱的、捡破烂的、磨刀的、补锅的、叫花子。^③如此细腻的爬梳与揭示,对于我们科学地运用阶级分析方法,无疑具有示范作用。显然,运用阶级分析方法,并不意味着去除掉鲜活的历史血肉。历史上阶级的构成不仅是复杂的,而且处于变化或分化之中,这就要求阶级分析的运用过程也必须紧密地与历史实际相结合,绝非仅仅贴一个标签了事。

其次,在根本动力的意义上,马克思科学而具体地贯穿了唯物史观的根本原则。马克思指出,古代阶级斗争同现代阶级斗争在物质经济条件方面存在根本区别。恩格斯在上面所引述的那段话后面,紧接着写道“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可见,在阶级斗争这一直接动力背后,还隐藏着更深刻的根本动力。这一根本动力,只能到人们的物质关系、生产关系、所有制关系中去寻找。

在充分揭示与分析直接动力的时候,马克思总是在文字可以有机衔接的地方揭示根本动力。在论述秩序党中两个大集团彼此分离的原因时,马克思指出,造成它们分离的原因,“是由于各自的物

^① 联系恩格斯的上下文,所谓“这个理论”是指“历史唯物主义”,而不是单指“平行四边形”那段话。换言之,“平行四边形”云云,位于“历史唯物主义”下面与里面。它们不是平行或并列关系,而是隶属关系。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23页。

质生存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财产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①关于所谓“拿破仑观念”,马克思在深入分析其产生的物质原因之后指出,那“都是不发达的、朝气蓬勃的小块土地所产生的观念”。^②将对社会观念的考察最终归结到土地关系,这正是所谓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的要义所在。

再次,在物理合力的意义上,马克思全面而圆满地揭示了历史演变过程中的全要素。马克思说,他要证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了一种局势和条件,使得一个平庸而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③要达到这一目的,就要在历史根本动力、直接动力的前提下,对于历史全要素进行充分展示,揭示它们之间的合成关系。

马克思在揭示秩序党两大集团分离的根本原因之后,并没有止笔,而是接续写道“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日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这有谁会否认呢?在不同的财产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凡此种种,都是构成历史合力的要素。这样的要素,还包括“宪法、国民议会、保皇党、蓝色的和红色的共和党人、非洲的英雄、讲坛的雷鸣声、报刊的闪电、整个著作界、政治声望和学者的声望、民法和刑法、自由、平等、博爱以及1852年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④等等。可见,对于历史要素的揭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是从不吝惜笔墨的。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史学不重视揭示历史要素从而不重视历史的丰富性与复杂性的观点,完全站不住脚。

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历史要素只能是“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借恩格斯的话讲,它们只是“外部必然性的形式”。20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全球史学界的一个共同趋向,是越来越重视对历史要素的描述与揭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不好,但是,如果它脱离历史根本动力与直接动力的前提,成为一种无前提的自我本体性学术活动,那就必然会造成“碎片化”的局面。事实证明,必须重视揭示历史要素,但是,必须遵循马克思例示的路径、领域和方法去揭示历史要素。

马克思有一个重要思想,就是特别强调充分揭示历史条件。这个思想在他的著作中处处都有体现。他有一段名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⑤马克思在思考跨越所谓“卡夫丁峡谷”时,着眼点就是实现它的各种历史条件。对历史条件的追问、梳理与揭示,就是阐明历史要素,也就是展示历史合力。

最后,马克思的历史动力与合力思想,是在动态考察和分析历史演进的过程中展开的。根本动力处在第一层次,直接动力处在第二层次,物理合力处在第三层次,它们相互结合,构成有机整体,同时在考察历史变化的进程中予以点题、呈现,实现思想方法与研究方法的统一、研究过程与叙述过程的统一。

我们知道,《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采用了编年史分阶段的叙事模式,依照事件演变的自然进程来夹叙夹议。这样处理题材的好处,是不仅尊重历史对象的完整性,而且体现了其动态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572—57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6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第470—471页。

正是在动态性的考察中,马克思依照直接动力、根本动力、物理合力的逻辑秩序,不仅科学揭示了“时代的总的性质”,而且揭示了各种历史要素的能动性。它既避免了像雨果那样由于单纯注重能动性从而忽视了根本动力与直接动力,也避免了像蒲鲁东那样由于过度注重“历史发展”的必然性从而忽视了历史人物的能动性。马克思的实践验证了恩格斯关于历史动力与历史合力思想辩证的科学的价值,是人们正确体悟、理解历史合力论的科学参照。而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中,虽侧重点有所不同,但实践的过程、表达的思想与马克思都是完全一致的。

总之,笔者认为,历史根本动力、直接动力、物理合力三个层次相互区隔又紧密联系的观点,既符合马恩的原意,也符合他们的实践。马克思和恩格斯均高度重视历史的物理合力,但他们从来不要忘记提醒人们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①而谈到动力,在马恩笔下无非是两条:一是阶级斗争,二是所有制关系。

在汉语中,“合”字既有聚合、汇合、扣合、闭合之义,也有整体与全部之义。而“力”字则“象人筋之形”。于此可见,汉语的“合力”概念本身就既包含汇聚而合成的各种分别的力,又包含具有统合作用的核心之力(如同人筋)。这是一个统一性与多样性相互扣合的概念。出于具体语境的需要,恩格斯所强调的,是“合力”的聚合性与汇合性。恩格斯认为,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以及《资本论》第1卷第24章,均是揭示聚合性的典范之作,因为它们的着眼点,都是“特殊作用”。但是,恩格斯又不断强调,这些特殊作用“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伟大的发展过程是在相互作用的形式中进行的,但相互作用的力量很不相等,“其中经济运动是最强有力的、最本原的、最有决定性的。”恩格斯说,我们把经济条件看做归根到底制约着历史发展的东西,它构成一条贯穿始终的、唯一有助于理解的红线。“通过各种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性,归根到底仍然是经济的必然性。”因此,既不能把唯物史观当作不研究历史的借口,而是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同时,时刻不能忘记,即使对哲学,经济发展也具有“最终的至上权力”。经济虽然并不重新创造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谈到“相互作用”,恩格斯总是将之与“形式”、“偶然性”之类概念连类。很明显,恩格斯的思想既充满辩证法精神,也是有重点的。对此,恩格斯在一封信中提出,不要过分推敲他所说的每一句话,而应该“把握总的联系”,亦即领会精神实质,得意忘言。这显然同样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作者李红岩,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研究员;邮编:100026)

(责任编辑:吴英)

(责任校对:张文涛)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第304页。

SUMMARY OF ARTICLES

Revisiting Engels' s Theory of the Convergence of Forces in History // Li Hongyan

In pursuit of a balanced view of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Friedrich Engels phrased the resultant theory with a specific goal to illustrate the role of non-decisive factors 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Class struggle is the direct driving force , and economic relations are the ultimate driving force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these are the essential arguments in Marx' s and Engels' s view of history. Yet ,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conflict between class struggle and resultant theories. The latter cannot replace the former. Marxists need to unite ideological views with research methods in examining the dynamics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s for the direct driving force , they employ the method of class analysis; as for the ultimate driving force , they follow the principle of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as for the panoramic view of historical development , they adopt the resultant theory.

The Application of the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 Zhang P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storical 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 not only meets the demand of academic research in the age of digital information , but also furthers historical research in depth. As a system for historical information storage , display , management , and analysis ,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data platforms have become recently available in China. The contribution of GIS to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is noticeable especially in the nine areas , including historical climatology , rivers and landforms , urban and township economy , rural settlements , hydraulic projects and water management , environmental changes , ancient cities , ancient cartography as well as HGIS research methodology. The introduction of GIS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history not only induces changes in research methodology but also updates the field with new ideas. For instance , the use of diverse sources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 including historical texts , ancient maps , remote sensing images , helps us to dynamically trace and comprehensively analyze historical materials. However , constrained by the boundaries of academic disciplines , the infrastructure of the HGIS studies remains fragile , and its development has been slow. These factors have prevented the further application of GIS in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The Mutation around the Year 1000: The Rise and Decline of a Paradigm of Interpretation about the Feudal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 Huang Yanhong

The mutation around the year 1000 or the “Feudal Mutation ,” first elaborated by Georges Duby , then developed by Pierre Toubert , Pierre Bonnassie , and others ,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feudal society in Western Europe. This interpretation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chronology of the formation of feudal society , and places the critical moment of transition between the years around 1000 to the mid eleventh century; it maintains that the formation of feudal society was the consequence of the disintegration of the Carolingian State and the degradation of public power into private power held by chatelains; and among the violence and disorder caused by feudalization , new social strata emerged from the old social relationships. During the last decade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 this mutation thesis was challenged in many aspects. The critics argued that the social mutation was a misreading of the new writing